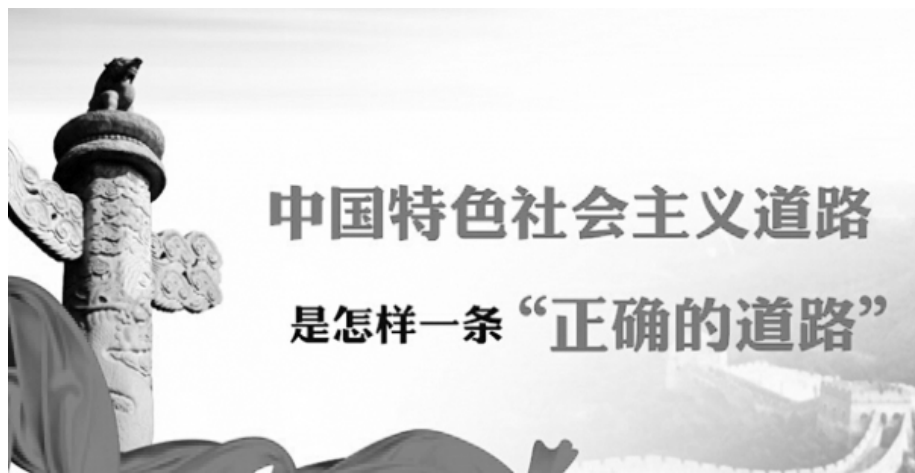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借鉴与超越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

■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课题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怎样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三,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受困”后,我们党认识到,不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深层次的制度变迁,就难以将国有企业塑造为真正适应市场竞争的主体。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被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它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其实质就是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建立现代公司制企业,以促进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职责分开,建立权责对称的激励约束结构,从而推动国有企业真正走向市场,成为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与产权制度改革并行的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产权理论认为,现代公司制企业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格局。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在关于企业经营状况、不对称,必然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即在代理人可能与信息优势为自己谋利,甚至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克服委托—代理问题,确保经营者的行为符合所有者利益的一个关键举措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以明确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的权责关系,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标志着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式进入公司化改制并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产权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得到明显提升,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其中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仍然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改革任务。

第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环境的不断完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产权理论中,交易成本最初是指利用价格机制完成交易所花费的成本,包括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交易的谈判和签约成本、契约的履行成本等,后来这一概念的内涵被不断扩展,以致经济学家阿罗将其看作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由于交易成本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资源耗费,交易成本过高则会降低制度运行效率,削弱经济主体的动力和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就成为评价制度变迁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的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改革可以视为旨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制度运行效率的制度变迁过程。在改革进程中,由于市场体系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有鉴于此,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清理规范中介服务等手段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交易成本”,并通过财税、金融、社保、能源、流通等领域的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的综合成本,从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资源配置扭曲,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培育新动能。在肯定产权理论对我国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借鉴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西方产权理论的形成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其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私有产权是比公有产权更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这一观念推崇到极致就不会推导出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就是将有公产权转变为私有产权,以致主张通过私有化来推动所有制改革。显然,我们要坚决摒弃西方产权理论的这一错误观念,避免将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引向歧途。实际上,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产权制度改革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所有制改革与产权制度变迁模式,即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实现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首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仅有利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而且有利于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协调和统一。尤其是通过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军工行业、公共产品、支柱产业等领域集中,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和安全保障,进而有利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充分发展。其次,非公有制经济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济成分,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主体多元化,形成了多元竞争格局,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有利于促进各类主体加快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国有企业形成了加快改革和发展的压力,而且成为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资本多元化、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最后,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形成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资本与劳动“双重联合”的利益共同体,进而最大限度地克服或减少公与私、劳与资的内在冲突。

由此可见,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中国所有制改革和产权制度变迁的实践和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不仅要研究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合理分工、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内在关系和内在规律,而且要从现代企业制度和财产组织形式层面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内部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资本与劳动联合的权利关系和内在规律(韩保江,2016)。

三、关于西方经济学中政府规制与干预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中,宏观规制与干预理论通常是指为解决微观领域“市场失灵”问题而采取政策干预和为实现宏观领域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进而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物价稳定、采取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运行目标而采取宏观政策干预,最典型的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市场规制理论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宏观干预的理论基础则主要来源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由于市场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搭便车”行为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进行“规制”,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否定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社会的总产出会偏离潜在产出水平,从而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失业。这种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源自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能够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改变总需求,进而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熨平经济周期(萨缪尔森、诺德豪斯,1999)。由于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经济普遍陷入“滞胀”状态,以现代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掀起了反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尽管这些经济学流派大多反对政府干预,拥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是它们的许多理论观点无疑对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货币主义认为,名义总需求主要受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而财政政策对产出和价格的影响微不足道,因此,宏观政策的核心就是采取以控制货币供给为核心的“单一规则”,即根据长期的经济增长率确定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引入“理性预期”概念,认为由于人们可以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做出无偏的经济预测,政府不可能通过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活动,由此引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避免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固定的、可以预见的规则更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过分强调需求管理,而忽视了税率和激励对总供给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从供给侧入手,通过减税、放松规制等政策改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激励,从而增加储蓄和投资,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萨缪尔森、诺德豪斯,1999)。西方经济学中的(萨缪尔森、诺德豪斯,1999)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政府干预经

验的理论总结,对于中国在改革与发展进程中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在理念层面,我们逐步接受了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政府干预”及其宏观政策目标观,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手段。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使用了“宏观调节”这一概念,提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要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才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宏观调控”这一概念,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强调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同时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改革方面迈开步伐,形成综合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了“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并规定了国家计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定位与职能。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并且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因此,在宏观调控的目标、思路 and 手段上也更自身的特色。从宏观调控目标看,除了与西方宏观调控相似“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总量调控目标外,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涵盖了诸多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如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产业升级等内容。尤其是伴随经济快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问题日益凸显,宏观调控与结构调整的联动性更加明显。党的十八大就特别强调把宏观调控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发展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胡锦涛,201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看,也更加强调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与国家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相互协调,形成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同时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的协调配合,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其次,在宏观调控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改善宏观调控方式,保持宏观经济总体稳定。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经济总体上处于“短缺”状态,因此这一时期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抑制周期性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调控手段也主要采取计划和行政的方式,通过“关停并转”来强行压缩总需求。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宏观调控的工具日益丰富,调控方式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尤其注重综合运用税收、价格、产业、信贷、汇率、利率等多种手段调控经济,并注重政策间的搭配协调。从1998年开始,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时代,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中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因此,从1998年开始,中国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党的十六大报告还进一步提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坚

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根据形势需要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因而这一时期的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凯恩斯主义刺激和扩张总需求政策的特征。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面对严峻的外部冲击,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由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胀转变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扩内需、保就业”的目标指引下,国务院出台了投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扩大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从而促使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经济复苏。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暴露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性问题。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调控方式也从侧重需求管理转向更加注重供给管理。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的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经济可以承受的底线。在不断探索和调适过程中,宏观调控手段日益娴熟、灵活,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从调控取向来看,宏观调控逐步实现了从直接调控到间接调控转变。从调控手段来看,逐步实现从行政手段向经济手段的转变,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特别是通过更规则的调整改变微观行为主体的利益结构和心理预期,从而使其行为符合国家调控目标。从调控方式来看,从注重总量调控向总量和结构并重转变。总量调控主要关注经济总量、投资规模、信贷规模等指标,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总供求关系,熨平经济周期;结构调控则更加注重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方面的比例关系,并通过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万勇,2008)。此外,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在宏观调控的同时更加坚持深化企业、价格、财税、金融、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府行政管理等领域的改革,以消除产生经济波动的体制根源。

最后,在经济新常态下创新宏观调控理念和方式。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呈现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三大特征。如何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势头的前提下,稳步有效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换,是宏观调控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努力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多元平衡,我国在宏观调控领域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和政策创新。

一是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提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的力度,增强针对性和准确性”。区间调控是指经济增速目标不再简单定住一个绝对数字,而是在一定区间内可以灵活调整,区间的下线锚准“稳增长、保就业”,区间的上线设定为“防通胀”。所谓定向调控是指针对不同部门和人群实施差异化的、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如对小微企业、“三农”采取降税、降费、降息、降息等优惠政策,以减轻其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进一步拓展了宏观调控目标,兼顾增长、就业、通胀等多元目标,增加了对经济波动的容忍度,避免宏观调控政策频繁变动,促进市场主体形成稳定预期。同时,这些新的措施提高了宏观调控的精准度,尤其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实施精准调控,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强烈刺激带来的宏观调控低效率和“刺激后遗症”。

二是在宏观调控中加强预期管理。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实施宏观预期,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预期和引导社会预期”。由此可见,加强预期管理和引导成为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如前所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十分注重“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认为市场预期如果不稳定,就会诱发各种短期的投机行为,引发经济秩序紊乱,并削弱政府调控的有效性,因而预期管理日益受到各国宏观调控当局的重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预期管理形式和手段更为多样化。例如,通过全面客观地分析宏观经济形势,阐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从而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通过及时准确地发布宏观经济信息,科学解读国家各项政策,使公众理解国家改革举措和发展的意图,稳定预期。当市场出现突发事件可能引发社会恐慌时,通过多种措施对非理性预期进行规范、引导和控制,防止出现经济大起大落和社会失序等。总之,将市场和社会预期纳入政府决策和宏观调控成为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方式的一个重要创新。

三是加强供给管理和结构性改革。长期以来,我国在宏观调控方面比较善于使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但需求管理在确

保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催生了产能过剩加剧、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上升、房地产泡沫膨胀、经济结构调整拖延等问题。因此,必须转变宏观调控理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中国经济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矛盾和问题,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西方供给学派在调控思路和方法上只强调供给而忽视需求,只强调市场而盲目排斥政府。此外,奉行供给学派思想的西方政府还采取了诸如偏向富人的减税,大规模私有化、去规制化,打击工会组织等措施,“修复”资本家的赢利能力。从实践来看,西方供给学派的调控效果不仅饱受争议,而且其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包括使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金融自由化无序发展、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生产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其根本目的是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重点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体政策表现为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力度,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共中央宣传部,201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传统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的重大超越和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四、关于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什么样的增长是理想的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实现这一增长。经济发展理论则更加关注发展中经济体如何实现从贫困到富裕、从欠发达状态走向发达状态的路径和战略,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变迁。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在3个方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一,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现代西方经济学经过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归纳出驱动增长的四要素:一是人力资源,主要包括劳动力数量及其人力资本水平;二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森林、能源、矿产等;三是资本形成,既包括私人资本积累,也包括政府投入的社会基础资本;四是技术变革和创新,即生产过程中的变革或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引入等(萨缪尔森、诺德豪斯,1999)。在这四大要素中,经济学家更加重视技术变革和创新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第二,经济发展的结构分析。发展经济学认为,制约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结构层面,如经济结构刚性、短缺、过剩、滞后、低供求弹性等,这些因素使得市场机制不能自动调节经济结构,需要发挥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中,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具有独特地位。在存在二元经济的国家中,发展的核心在于经济二元逐渐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最终消除二元结构,实现全面的现代化(陈宗胜,2006)。第三,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当代发展经济学充分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把制度视为促进发展的关键变量。一套有效的制度、组织和治理机制,能够创造强有力的激励结构促使人们将资源禀赋投入创造财富的活动中,促进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往往由于制度和组织方面的缺陷长期陷入欠发达状态。因此,只有“矫正制度”,才能真正完善市场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配效率、扩展经济机会,从而培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进行中国30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构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已有的研究看,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将既有的“人口红利”、经济转型的“结构红利”、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汇聚、叠加,形成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看,劳动投入、自然资源、资本积累和创新都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日益凸显。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提高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使其在不过多投入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条件下,也能够提高产出水平,从而将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大幅度推移。